



废品 生活

垃圾场的经济、
社群与空间

胡嘉明 张劼颖——著

废品 生活

垃圾场的经济、
社群与空间

胡嘉明 张劼颖——著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 2020 by Life Bookstore Publishing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废品生活：垃圾场的经济、社群与空间

©香港中文大学 2016

本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授权出版，本版限在中国内地发行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废品生活：垃圾场的经济、社群与空间 / 胡嘉明，
张劼颖著. — 北京：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，2020.1

ISBN 978-7-80768-307-0

I. ①废… II. ①胡… ②张… III. ①废品回收
IV. ①F713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181732号

责任编辑 李方晴

装帧设计 罗 洪

责任印制 常宁强

出版发行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)

邮 编 100010

图 字 01-2019-6648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顶佳世纪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20年1月北京第1版

202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 本 880毫米×1092毫米 1/32 印张7

字 数 120千字 图10幅

印 数 0,001-5,000册

定 价 38.00元

(印装查询：010-64052066；邮购查询：010-84010542)

目 录

中文简体版序 / 1

导言 废品的政治与文化 / 7

I

城市采矿人

废品回收作为非正式经济 / 31

1. 回首跌宕京漂路

一个女收废品人的口述创业史 / 45

2. 低端企业家

北京收垃圾，老家拾尊严 / 58

3. 底层的生存策略

从“超生游击队”到“黑心小作坊” / 69

II

垃圾场上的家园

拾荒社群的组装家庭和想象的老家 / 81

4. 拾荒父子

离愁与创业梦 / 99

5. 年轻的母亲

垃圾场上育儿的苦与乐 / 115

6. 拾荒第二代
垃圾大院“回娘家” / 124

7. “这就叫自由”
拾荒者中的“老北京” / 137

III

废品的空间
城乡接合部 / 151

8. 冷水村的引路人
连接城乡的黑车师傅 / 172

9. 老乡邻居交错相逢
装修父子的教育梦 / 187

10. 垃圾场上的高跟鞋
时尚、尊严与母爱 / 200

结语 废品生活 / 211

参考文献 / 215

中文简体版序

距离最初在冷水村开展田野工作，已十年有余。十年来，无论是城市空间、冷水村，还是废品行业、其从业者，乃至我们自己，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。

就个人而言，十年前，社会世界那些幽暗的、不为人所关注的边缘，强烈地吸引着我。凭着好奇心和一种冲动，展开了这本书的田野。这成为我社会学职业旅程的开端。如今初为人母，做起田野来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勇猛，却也更加可以理解“垃圾场上育儿”的年轻妈妈们的想法和做法，体会她们的艰辛困顿。女性经验再一次地将我们紧紧连在一起。一些拾荒家庭因为户口壁垒，加之生计所迫，一再面临亲子分离，孩子不可避免地成为留守儿童。说起这些，仍感痛心。不过，我愿意不厌其烦一再表达的是，在这本书当中，我们

并不试图寻找最大受害者，不希望把拾荒者塑造成一个最卑贱、底层、被侮辱与损害的群体，进而仅仅为了告诉你一个故事——他们有多悲惨。作为社会科学研究，一方面，我们试图呈现这个群体的丰富性和多元性。我们不愿意把他们变成中产阶级观看和怜悯的对象，而是把他们放在主体的位置上，用“主体间”的方式去观察、去讲述。更愿意告诉读者的故事是，他们与我们紧密相关，“他们”就是“我们”。另一方面，“主体间”的视角并不意味着取消反思性与批判性。社会科学研究试图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去理解这个群体，去分析、去批评为什么这个群体被剥夺，不公正何以发生。

这些年来，我们的城市不断经历空间改造、功能重组、产业升级与正规化，随之而来的是低端人口出局、废品行业紧缩。与此同时，伴随着垃圾分类的高歌猛进，垃圾议题也日渐显著。十年前，垃圾不过是我们不假思索、随手扔掉的废弃之物，没人在乎它们去了哪里、发生了什么、由谁来负责。有关垃圾的研究显得另类，这本书的书稿也因为不合时宜而难见天日。今天，垃圾已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非常显眼。你可以反感或者厌恶，却很难摆脱掉它。你没法轻易地视而不见。

或者说，我们终于发现了这一事实：垃圾确实无处不在。

或许，正应该感谢垃圾，它作为一种标志、一个节点，让我们注意到人类所处于其中的巨大的物质网络。所有人、动物、植物、技术、商品、垃圾、空气、海洋，万物皆相关联。这正是本书讲述的故事。我在北京二环用手机点一份外卖，不到24小时，废弃的饭盒就到了五环外的一个年轻拾荒者手上。现在，同一个垃圾袋里还有我女儿的玩具部件，它混合着金属、塑料和两节一次性干电池。年轻人的儿子在垃圾山中发现并继续玩耍这玩具。再造后，这些垃圾又变成了手机APP上售卖的廉价塑胶小黄鸭，被我买回家给女儿，隐隐地散发着古怪的气味。没能再造的垃圾最终被送进焚烧炉，和其他垃圾在850度的烈焰当中燃烧、化合，最后化为一缕烟尘。一阵北风刮来，被我吸回体内。所以，当上海大妈问“你是什么垃圾”的时候，别笑，垃圾确实是我们的一部分。

令人欣慰的是，我注意到，开始有城市规划者、新闻媒体、环保者乃至企业追问：在垃圾分类大潮中，拾荒者的角色是什么、功能是什么？他们受到了什么样的冲击？他们可以做什么？我们又可以为他们做什么？要回答这些问题，需要调查垃圾当中不同物质的循环和回收机制，调查废品行业的运作方式及其从业者的现实处境、想法。这些都需要更多在地的、细致的、实证的社会科学调查研究，需要到田野中

进行观察，需要与现实的从业者对话。

同样地，垃圾分类问题本身也需要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。垃圾分类研究不能流于简单的臆想或者重复“提高居民素质、加强环保教育”之类的陈词滥调。社会科学有责任给大众提供一种全新的看待垃圾的眼光，讲述一个完整的关于“物的社会生命”的故事。在这样的故事中，垃圾分类的信息不再是刻板的、截断的、碎片的、强制灌输的。在这样的故事中，公众得以获知垃圾的来龙去脉，垃圾究竟是什么，它如何产生、会到哪儿去、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严峻的社会/环境问题；为什么要垃圾分类，尤其是，为什么要这样分类，其合理性是什么，又存在哪些不合理之处。社会科学提供这样的知识，公众基于这些知识重新理解自身与垃圾的关系，对于垃圾分类做出自己的判断，进而形成新的常识、新的实践。

最后，作为结束，回到个人经验。在哺育一个新生命的过程中，我见识了新世代的人类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物质盛宴——从尚未出生开始，生活和身体，几乎没有什么细微的方面不被开发为消费的领域，没有什么不是被消费所充斥、所裹挟。我要感谢随之而来的大量垃圾。它们的存在，就像不断发出蜂鸣的报警器一样令人不安。如果说，多年的垃圾研究使我产生了什么改变，那就是，让我可以对这种无限量

供应的快乐保持一种警觉。问题是，如果想要改变，我还能做什么。要在这样的经济和生活系统当中突围，并不容易。社会学的启示是，一方面，让我们认识结构的规制性的作用；另一方面，让我们相信个人的能动性的力量。正因此，我仍然保有勇气，尝试不断地在个人的经验与实践当中反思、突破、创造。与读者共勉。

张劭颖

2019年9月29日

导 言

废品的政治与文化

“垃圾围城”

没有人喜欢垃圾。垃圾肮脏，而且是“没用”的！不是吗？没有人喜欢肮脏而且没用的东西。城市生活处处光鲜亮丽，整洁如新。在公司、学校、住宅楼、大商场里，清洁工会随时扫去脏东西，把垃圾丢藏在最隐蔽处。其实，我们在城市里大量消费，也大量丢弃——消费会带来快感，扔东西也是种乐趣。拆开新的商品，把包装扔掉；吃不完的饭菜，可以倒掉；东西多了、旧了、不想要了，可以丢掉。现代都市人，谁不能领会“喜新厌旧”的要义？种种消费的增长，同时导致垃圾以爆炸性的速度激增。

中国过去二三十年迅速发展，造就了惊人的经济奇迹，

工业化和都市化的双重作用，加速了城市规模扩张及城市人口膨胀；城镇居民急速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主义，衣食住行日新月异，消费品不断推陈出新，耐用品也大大减短了寿命。在“保八”（保持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在8%以上）、“电器下乡”（把电器消费品推广到农村）、“结婚要有房又有车”等语境下，更多的消费品被生产出来；抛弃更多为了消费更多，似乎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现象。同时，这个过程也催生了大量的废弃物。各地政府尽管不断加建垃圾处理设施，其速度却始终追不上城市生活垃圾的增速，造成“垃圾围城”之局面。为了应对这个困局，多地政府提出兴建垃圾焚化炉，又遭到民众的强烈反对，环境维权运动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。简而言之，当代中国在享受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，已经泥足深陷于垃圾之战。

在正规的垃圾处理体系之外，每个城市还有一个群体，天天与废品或垃圾打交道。他们寄居在城市的边缘，垃圾成了他们的生产资料，成了他们在城市建立生活、获取收入的资源。他们就是人们常说的拾荒者、废品收购者，或“收破烂儿的”“捡破烂儿的”。他们在城市里似乎既是无处不在的，又是“隐形”的——我们习惯了他们居于城市的角落，隐约知道他们在垃圾或废品中劳作，但几乎对这个群体一无所知，

我们不想了解他们，甚至有意地忽略他们。

本研究的目的，是了解这个每天帮助城市排废却不受关注的群体，从废品经济和空间的角度，重新审视中国的城市化。本书所研究的冷水村，位于北京六环外的一个“城乡接合部”（本书第三部分将详细解释这一空间），里面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收废品院落，这些院落既是储存、处理废品的场所，同时也是废品从业者的家园、厨房、休闲场所，以及他们的小孩的游乐场。冷水村只是当今盛世中国的庞大垃圾经济的冰山一角，但非常具有代表性——城市垃圾被运往城乡接合部处理，污染物被尽量外移；废品回收群体将垃圾以自己的方法处理、再循环，他们自己也在城市的边缘谋生。

收废品者在当代中国是一种双重的污染符号——他们不但是城市的外来人口、农民工，同时又很脏，有点神秘甚至危险。因为每天与垃圾这种肮脏的物质打交道，他们被再度污名化。可以说，如果农民工是城市居民的“他者”，废品从业者便是所有现代城市人的“双重他者”。研究当代中国的收废品群体，能帮助我们了解这个在城市化过程中一直维持着“非农非城”的边缘性身份的群体，以及我们每天的消费行为和这个群体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本书希望把这个社会建构的自我和他者重新联系在一起。

通过审视废品、废品经济、收废品人，我们尝试重新看待这个城市的消费与浪费，重新理解废品回收经济和空间如何与我们息息相关。与其说我们对所谓“边缘的”“贫穷的”捡破烂儿人群感兴趣，不如说我们希望解构这些二元的建构，通过了解废品从业者的工作和生存空间，进一步认识我们的城市成员、城市化，以及中国特有的现代性问题。

反思废品的文化意义与物质性

垃圾——在通常的理解当中，完全是死物、废物，是无用的。但如人类学家玛丽·道格拉斯（Mary Douglas）早在其20世纪60年代的著作《纯洁与危险》（*Purity and Danger*）中指出的，不洁物（dirt）在每个社会，不论现代还是原始，都是相对性的，而且是相当重要的社会文化符号。她指出，人们认知不洁物，不在于它本质上就是肮脏的，而在于它的暧昧、不可界定、不确定，也在于它安排和界定着一个社会中什么是对与错，什么是神圣（sacred），什么是凡俗（profane）……有研究者指出，垃圾处于一个“被抽干意义的异化的物的世界”，而正是社会和文化赋予其“可被丢弃的”、没有意义和价值的属性（Kennedy, 2007）。由此，审视污染物（pollution）的社会

意义不在于研究它的内在性，而在于它的暧昧性（ambiguity）及它与我们社会系统中其他“物”的关联；在于研究我们如何追求一套新的卫生标准，如何追求在一个习惯用完即弃的社会（disposable society）对待本来“有用”之物（Harvey, 1991）。

文化理论家齐格蒙特·鲍曼（Zygmunt Bauman）称垃圾处理者为“现代社会里的无名英雄，日复一日地更新和突出正常与病态，健康和疾病，想要的和不想要的，接受的和丢弃的，应该的和不应该的，人类宇宙空间的内在和外在的边界”（2006: 21—22）。换言之，垃圾处理者每天的劳动不但是帮我们的城市排污，减少堆填区的负担和垃圾焚烧所排出的污染物；他们主要的贡献，是防止因为“有用”和“没用”的界限模糊而可能产生的混乱。试想，如果垃圾在我们的住宅区堆积如山，如果废弃物让本来光鲜洁净的消费场所臭气熏天，将会是怎样令人难以忍受的场景？在这个意义上，收废品者和清洁工人为社会生活的正常运作做出贡献，日复一日地维护着日常生活中“物”的秩序，默默地拿走不正常的、病态的、不想要的物质，维持着一个社会的“正常规范”（social norms），也就是一个社会“应该有的样子”——这是如此正常，以至于我们以为事情本该如此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正是这些背

负着双重污名的收废品人，为资源回收再利用和环保做了莫大的贡献。也可以说，他们直接维持着中国现代性光洁的那一面，不让垃圾充斥和呈现在我们的视野里，不让我们哪怕有一刻怀疑经济发展，看见肮脏、浪费的那一面。

在中文的文献中，对来自农村的拾荒者的研究，大多将其视为当今中国城市化过程中，城市管理所面临的一个“社会问题”；换句话说，将这个群体视为难以有效纳入管理的一群人（张登国，2007；赵泽洪等，2005）。这个角度跟国外的研究不谋而合。中国以外关于收废品人的研究，同样侧重发展中国家里城市管理所面临的问题：城市的高速发展，远远超过原来的废品处理承受力，大量都市废品的产出和处理需求，又吸引人口众多但没有特别技能的农民转移至城市。这些城市农民工通过捡收和转售垃圾，脱离农村、进入城市谋生；废品回收成为一个主要的非正式经济^①圈，不但解决了垃圾围城的问题，也同时给众多农民工提供了谋生机会

① “非正式经济”（informal economy）是指政府和正规资本都不介入的经济领域。政府不介入是因为它不属政府认为应该提供的服务，而政府要管理这些活动又成本太高；正规资本不介入是因为利润太低，由于无法集约生产，成本太高。这样便造就了约定俗成的各种非正式行业或非正式经济活动，比如部分的家庭保姆、个体工匠、流动摊贩、手工作坊、山寨厂等等，从业者是在当前的社会情境下，一种在法律边缘和强大需求之间被催生的经济活动从业群体。